

天宝初宗正寺扩容与李白心迹

——墓志文献中属籍记录与李白谒李彦允事本末

查屏球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摘要:《李湛墓志》等记录开元末天宝初玄宗对宗正属籍有扩容之举,影响甚大,多人墓志都将此作为提升门第的一项标志。李白也受此影响,其于天宝元年秋入京或与此事有关,天宝三载他离京后直接找李彦允,就缘于李彦允因扩容政策准许属籍宗正寺。李白在此之前称身世,仅言“陇西李氏”,此后多称凉昭武王后。天宝二年后,官方寺观道士由宗正寺改隶吏部司封,进入正式官员选拔序列,李白求李彦允以宗室高官身份介绍自己受策入道籍,亦有谋取皇家宫观之职的愿望。将相关作品置于这一背景下考察,既可见出李白在门第制度下所遭受的不平等与压抑感,亦可见出诗人不断进取拼搏的精神。

关键词:宗正寺;扩容;墓志;李白;李彦允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5)01-0122-12

DOI:10.19742/j.cnki.50-1164/C.250111

李阳冰《唐李翰林草堂集序》载:“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赐金归之。遂就从祖陈留采访大使彦允,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箓于齐州紫极宫,将东归蓬莱,仍羽人驾丹邱耳。”^{[1]卷三十一,1443}李白在人生的高光时刻离开京城,仅一年多就离京,具体原因,除李阳冰解释外,尚有多种说法。笔者以为可由其离京后去向推导出动机。离京后为什么马上要找李彦允介绍自己到齐州入道。对此注家少有关注,深加追究,可对争议问题作一新解。

由笔者考察,李白此举与其身份出身焦虑相关。唐朝仍是世族社会,仕宦、婚姻皆依据门第身份,如郑樵《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言:“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2]卷二十五,439}因此,伪饰家史,抬高门第,也是一时风气。身世卑贱是李白人生的原始起点,他的家族给他虚拟了一个“陇西李氏”出身,为维持这一名号的有效性与可信度,他做了诸多努力,或远离本家,割断自身商民子弟的印迹,或娶没落相府孙女漂白出身,或与诸多陇西李氏攀附关系,效果都不明显。年过不惑,受到玄宗礼遇,声望陡升,一飞冲天的理想得到实现。但出身与身份焦虑仍是如影相随,挥之不去。飘然离京,直奔济州道观,是因他看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天宝初,唐玄宗扩容宗正寺属籍,提升李晁之后地位。此事在天宝初影响甚大,对李白也有所触动。近来新出相关墓志多可佐证此事反响,据此可具体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与李白心迹。

收稿日期:2024-12-05

作者简介:查屏球,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日韩藏唐诗选本研究”(18ZDA249);贵州省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项目“日韩藏稀见唐诗选本研究”(17GZGX10)。

一、由天宝墓志看唐玄宗扩容宗正寺之举的反响

阙名《大唐故巨鹿郡平乡县主簿李公(湛)墓志铭并序》记录了唐玄宗开元宗正属籍扩容之事:

……公讳湛,字万顷。其先陇西人也。周柱下史伯阳之后,国史家谍,尽备而详。德音克宣,代业昭著。七代祖韶,大魏兵吏尚书、兼侍中、姑臧公、赠司空。公政和阴阳,功镂钟鼎。既明且哲,前辉后光。曾祖讳玄成,隋潭府长史、济北郡太守。祖义瑛,皇朝散大夫、卫州共城、豫州上蔡二县令。宴邦之彦,为代作楷。教兴三善,人谣二天。考讳颢,兵部郎中、宣州刺史、左领军卫将军、东都留守、上柱国、姑臧县开国侯。名亚台司,位毗元宰。出入华省,优游禁门。妙简帝心,政允人望。千里不期而自应,三军闻化而攸归。实谓文武克崇,维恩□济矣。公则家承朱绂,声高文苑。执心泉澄,秉操峰峻。幽关洞启,独擅词场。虚怀博通,能开惠政。是知国家□土,实唯其人。当途剧职,非贤罔义。是用授公洺州邯郸县主簿。盖陟遐自迹,亦台阶之渐也。不□厥职,奄遘家艰。太夫人卒于内寝,哀何有极,孝闻于代。反车敷化,仁风载杨。说言嘉谋,溢于人境。上佐之百里高枕,下兼之六曹闲豫。才始临人,弥留寝疾。开元廿九年四月廿八日卒于官舍,春秋六十有六。■同寮抚膺,人吏攀慕。永言其德,中心是悼。岂意宸光曲照,本枝不遗。是岁七月,有诏曰:古之宗盟,异姓为后。王者建嗣,莫遗其亲。凉武昭王孙宝已下姑臧公等子孙,并隶入宗正,编诸属籍。则我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之族耳,辉耀当代,蝉联后叶……以天宝元年十一月,安厝于东京万安山南居大莹,礼也。……维天宝元年岁次壬午十一月□八日。^{[3]187}

墓志中所言“凉武昭王孙宝已下姑臧等四公子隶入宗正属籍”诏书,被收录于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六十四,题为《许凉武昭王孙绛郡姑臧等四公子隶入宗正属籍敕》:

古之宗盟,异姓为后。王者设教,莫遗其亲。殿中侍御史李彦允等奏称,与朕同承凉武昭王后,请甄叙者,源流实同,谱牒犹着。虽子孙千亿,各散于一方,而本枝百代,何殊于近属。况有陈请,所宜敦叙。自今已后,凉武昭王孙宝已下,绛郡、姑臧、敦煌、武阳等四房子孙,并宜隶入宗正,编诸属籍,以明尊本之道,用广亲亲之化。^{[4]卷六四,356}

诏书所讲李彦允入宗正属籍之事,《唐会要》卷六十五也有详明的记载,所记之事就是上面引用的诏书。将宗正属籍扩容到李曷孙辈四房是与批准李彦允入籍申请联系在一起的,《唐会要》记此事在天宝元年(742)七月,墓志却言在开元二十九年(741)七月,可正史籍之误。此事又与玄宗提升凉武昭王李曷庙享地位是联系在一起的,《唐大诏令集》卷七十八《追尊先天太皇德明兴圣皇帝等制》载其事,不仅追封李曷为兴圣皇帝,且扩大东西京玄元宫规模,配备专员管理。《旧唐书·礼仪志(四)》:“(开元二十九年)七月,陇西李氏敦煌、姑臧、绛郡、武阳四房隶于宗正寺。”“(天宝二年)三月壬子,亲谒玄元宫,圣祖母益寿氏号先天太后,仍于谯郡置庙。尊皋繇为德明皇帝,凉武昭王为兴圣皇帝。”^{[5]卷二十四,926}所记更确切,尊称西凉武昭王李曷为“兴圣皇帝”并提升庙享等级,宗正寺扩容到李曷其他子孙,都是一个系列的尊祖活动。上引《旧唐书·礼仪志(四)》记扩容之事是在开元二十九年七月开始,恰与墓志所记时间相合,足见墓志文献之可信。

《新唐书》卷七十《宗室世系表》叙:西凉武昭王李曷有十子,其中李歆、李愔、李翻有后传承,李愔建镇远将军房,曾孙为平凉房始祖。李翻孙三人,李丞开姑臧房、李茂开敦煌房,李冲开仆射房,曾孙李成礼开绛郡房,李豫玄孙李刚开武阳房。李歆是承李曷之位,为西凉后主,有八子,三子李重耳在国亡后南奔至刘宋,先为汝南太守,后投奔北魏,为恒农(弘农)太守、安南将军、豫州刺史。李重耳子李熙为北魏金门镇将,儿子李天赐又有三子:长子起头生达磨,为后周羽林监,太子洗马,长安县伯,无后;次子李虎,后周柱国大将军,唐国襄公,有八子,李渊之父李昝是其一;三子,乞豆,开定州刺史房。可表示如下:

表 1 唐王室世系表

髡,西凉武昭王、兴圣皇帝(十子:谭、歆、让、悋、恂、翻、豫、宏、眺、亮)					
悋,镇远将军房始祖也	平凉房始祖也				
第八子翻,字士举,东晋祁连、酒泉、晋昌太守	抗,东莱太守	思穆,字叔仁,后魏营州刺史、乐平宣惠伯	樊,字道休,北齐魏尹、广平侯	瓌,黄门郎	斌,散骑侍郎,袭乐平伯
	宝(七子:承、茂、辅、佐、公业、冲、仁宗)	承(丞,姑臧房始祖)	茂,敦煌房始祖		
		冲,仆射房始祖	成礼,绛郡房始祖		
豫				刚,武阳房始祖	
歆,字士业,西凉后主(八子:勔、绍、重耳、弘之、崇明、崇产、崇庸、崇佑)	重耳,以国亡奔宋,为汝南太守。后魏克豫州,拜恒农太守,复为宋薛安都所陷,后魏安南将军、豫州刺史	献祖宣皇帝熙,字孟良,后魏金门镇将	懿祖光皇帝,讳天赐,字德真(三子)	起头,长安侯	达摩,后周羽林监、太子洗马、长安县伯(无后)
				太祖(虎)景帝,柱国大将军、唐国公(八子)	南阳公、谯、蔡、毕、雍、郇、郑
					代祖元皇帝讳髡,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唐国仁公
				乞豆,后魏定州刺史	高祖渊,梁王澄,蜀王湛,汉王洪
					西平王普定、楚王灵夔、益府长史浚、麟,相肃宗、封令全

唐王室承李髡—李歆—李重耳—李熙—李天赐一系,唐初只立李熙以下四庙,之上诸祖并不在庙享之列,《唐会要》卷十二《庙制度》记:

武德元年六月六日,立四庙于长安通义里,备法驾,迎宣简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神主,

祔于太庙,始享四室。贞观九年,命有司详议庙制度……初议欲立七庙,以凉武昭王为始祖。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以为武昭远祖,非王业所因,不可为始祖。竟从之。^{[6]337}

神龙元年五月。东都创制太庙。太常博士张齐贤建议曰:“今之议者。或有欲立凉武昭王为始祖者,殊为不可。何者?昔在商周,稷契始封,汤武受命。汤武之兴,祚由稷珣。故以稷珣为太祖,即皇家之景皇帝是也。凉武昭王勋业未广,后主失国,土宇不传。景皇始封,实基明德。今乃舍封唐之盛烈,崇西凉之远构。考之前古,实乖典礼。魏氏不以曹参为太祖,晋氏不以殷王卬为太祖,宋氏不以楚元王为太祖,齐梁不以萧何为太祖,陈隋不以胡公杨震为太祖,则皇家安可以凉武昭王为太祖乎。……武德贞观之时,主圣臣贤,其去凉武昭王,盖亦近于今矣。当时不立者,必不可立故也。今既年代寔远,乃复立之,是非三祖三宗之意,实恐景皇失职而震怒,武昭虚位而不答,非社稷之福也。”⁽⁶⁾³⁴⁰

关于李曷以下入祀事,从唐初一直到中宗都有争议,可见唐初对宗室认定与管理比较严格,如李虎长子延伯曾为北齐散骑常侍,武德四年追封为南阳伯,附属籍,贞观初又罢之,与姑臧、絳郡、武阳公三房号四公子房,至开元二十三年(735)复附属籍。李曷之后其他房支如四公子房,长期不在宗正寺属籍中。天宝之前,宗正寺属籍多是从李天锡一辈算起,共五十九族。《唐六典》卷十六“宗正寺”条载:“九庙之子孙,其族五十有九”^{[7]卷六,465-466};光皇帝一族、景皇帝之族六、元皇帝之族三、高祖之族二十有一、太宗之族十有三、高宗之族六、中宗之族四、睿宗之族五。非直系者,只认李虎弟一房,其他各房支都不在宗正寺属籍之列。《唐六典》于开元十年(722)开始编写,于开元二十七年(739)完成,所记当为此前礼制,这表明至开元二十七年唐宗正寺管理的属籍仍只有直系五十九族。开元末,唐玄宗宗正制度有所松动。如开元二十八年(740)五月,孙逖《太子少傅李(曷)墓志铭》言:“先是,国朝旧制,不以宗亲任权。开元以来,内举无避,惟善所亲,擢拜右职,公为首也。”^{[8]卷三一三,1407}这里所言“不以宗亲任权”的情况在高宗武后朝益发突出,武后有意识全面打压李唐皇室成员,不断压缩皇室生存空间,削减宗亲成员。中宗复辟后,宗室势力抬头,但宗室参政也引起新混乱,玄宗有鉴于此,初期也控制宗室政治活动,保持宗正寺原有属籍。如《唐会要》卷六十五记:“开元十三年四月诏:‘嗣王有旁继者总宜总停。’”^{[6]1449}非直系王孙不能继承王位,自然也不入宗正寺属。但到了开元末,其政权已稳固,宗室原有属籍成员已大为缩小,就开始有意对宗正寺扩容,李曷孙李宝以下四房均被括入,范围大增。天宝之后,沿用此策。天宝五载(746)对宗正寺又有了新的扩容规定,“五载一月十三日勅:九庙子孙宜并升入五等亲,永为例程”^{[6]卷六五,1349}。将宗正寺属籍扩展到九庙子孙。由此看,宗正属籍扩容,正是在开元末天宝初启动的新政。

由《李湛墓志》看,玄宗对宗室的扩容与优惠政策在当时曾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这一点在其他相关墓志中也得到印证,如《大唐故中散大夫襄阳郡别驾上柱国李府君(庭芝)墓志铭并序》云:

十代祖曷,晋凉武昭王。天宝中,主上感肇霸之初,载兴王之业,有制册为兴圣皇帝。俾四公之后,咸属籍于宗正焉……始冠以孝廉甲科,寻丁江阳府君及太夫人之艰……解褐补怀州参军事,再辟汾州司户参军,转荆府兵曹。本道使给事中韩朝宗,以清白荐用改少府监丞,加朝散大夫除栎阳县令,迁絳州司马加朝请大夫,换陈留郡长史、朝议大夫,移襄阳别驾,加中散大夫,进勋上柱国。……以天宝二载捐馆于襄阳,春秋六十有五……太子内直丞京兆杜黯之书 天宝四载岁次乙酉七月丁巳朔十七日癸酉刻。^{[3]200}

《李湛墓志》作于天宝元年,《李庭芝墓志》作于天宝四载(745),两家都将属籍宗正寺为无上光荣之事,并以表明与皇帝同族来提升门第。对这一情况,可将同时期类似墓志与之前墓志进行比较后,显得更清楚。天宝前陇西李氏仅叙门第之美,少言与皇族关系,如:沈宇《大唐故雍州明堂县尉陇西李府君(惠)墓志铭并序》云:“公讳惠,字惠,陇西成纪人也,凉武昭王十一代之孙。自柱下生周,五千言之道德,将军在汉,一百战之功勋。玉叶金柯,门称甲族,衣冠礼乐,世传余美。”^{[9]31}李亘志《大周故成均监明经李君(准)墓志铭并序》曰:“君名准,字幼均,陇西城纪人也。十代祖曷,晋凉武昭王。五代祖韶,魏吏

部尚胥、雍州刺史赠司空，谥文恭公，世笃忠贞，名播图史。曾祖元俭，齐吏部郎、太原郡守。祖玄成，唐潭州长史，忠孝博学，著名当代。父义琛，唐雍州长史、岐州刺史。言行满于天下，道德流于海内。君即岐州府君第六之幼子也。”^{[10]30} 阙名撰《唐故蒲州猗氏县令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并序》云：“公讳景由，字逸客，陇西成纪人也。始系本枝，伯阳中抚，封于姑臧，后淳耀乎有凉，粤武昭王玄盛者，皋君为□叶矣，天下之人谓之甲族。”^{[11]426} 这三家自称是李曷之后，但未言与皇室同宗。天宝后，陇西李氏墓志多记录玄宗追李曷为“兴圣皇帝”一事，如王利器撰《唐故通议大夫使持节东阳郡诸军事守东阳郡太守上柱国李府君（先）墓志铭并序》写道：“府君讳先，字开物，成纪人也。其先祖颛顼高阳有才子，其姓标，后魏陇西为甲门。今天子不弃宗亲，弘我烈祖。天宝三载，以晋凉武昭王曷策为兴圣皇帝焉。昭王洎公十一代，则知盛德者百世祀，积善者余庆长。”^{[9]46} 卢绩《大唐故景城郡录事参军上柱国陇西李府君（景献）墓志铭并序》云：“裔子逃难，越去殷都。阡于死亡，大命将泛。以食木子，因而获全。遂改氏曰李，所由大矣。……汉魏已降，公侯继踵。是后有嗣宗职者，次及于事，藏在王府。梁（凉）封为武昭王。今上以祖宗之庆追赠兴圣皇帝，帝讳曷，则君八代祖也。”^{[12]365} 自此之后，自称李曷后者多强调与皇族的关系。如李仲言《唐故太原府祁县丞李公（士华）墓铭并序》曰：“公之先陇西人。族出始封，与我唐实本枝，煌煌乎如日昭然。惟我祖武昭王土于梁，建盛德，嗣休烈，至于我祖姑臧公，咸彰闻于天下。当时第百氏，俾居实品。故以我族及山东他族凡五为天下甲氏。”^{[9]125} 郑士林《唐故扶风澈司法参军李公（澄）墓志铭并序》云：“代为右姓，雄于西州。武昭王继天开业，姑臧侯让封建社。元伯遗爱，戍人陪冢。今之国族，首冠诸华。”^{[9]105} 李宪撰《唐故宣义郎行巨鹿郡参军李公（佑）墓志铭并序》写道：“公讳佑，字镜微，陇西狄道人，兴圣皇帝之十二代孙也。”^{[3]276} 裴璆撰《唐故乡贡学究李公墓志铭并序》云：“公讳颢，字□，陇西成纪人也。其先帝高阳之苗裔，虞夏之时，咎繇为大理，因官命氏，裔孙曰征，事纣得罪，其妻携子利贞逃难，食木子得存，因改理为李。凉武昭王曷之孙承，后魏龙骧将军雍州刺史封姑臧公，公即姑臧公之房也。”^{[10]260} 李茂升《唐故寿州团练判官试太常寺协律郎陇西李府君（茂昌）墓志铭并序》云：“公讳结，字明中，举进士，易名茂昌。其先陇西人，远祖凉武昭王以雄才启国，中代姑臧公以盛德受封，茂绪芳徽，冠映图史。姑臧公后分三房，官婚之盛甲于世。不有贵仕，即彰伟名。公居大房，蹇膺斯祉。”^{[9]227} 这四方墓志墓主都是出于李曷之后的远房，但仍强调自己房支与皇室同宗的关系。

由上可见，开元末天宝初，玄宗开始提升凉武昭王李曷在祖系中的地位，并据此对宗室扩容，接受如四公子房之类远支进入属籍，对陇西李氏身份认同产生很大影响，强化了他们与王室同宗意识。

二、李白天宝初活动与玄宗扩容宗正之策

从时间上看，李白天宝初的活动与此事也颇有关系，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七月颁布诏令认可凉武昭王一系四房隶入宗正属籍，李白于天宝元年秋入长安，两者当有关系。先前研究认为这是李白第二次入长安，其入长安缘由，是因得到玉真公主引荐。他与玉真公主的关系，是缘于都是司马承祯门下弟子，这种同学关系至少已有十五年，而到此时才能得到其助，当与其时宗正寺属籍扩容可能有关，否则，作为一介平民，能被当朝皇帝亲自接见，应是很难的事。天宝前，李白向人介绍自己身世，仅言“陇西李氏”，并不提武昭王九世孙的事情，如其开元十八年（730）左右自叙多如此，如《与韩荆州书》：“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1]1239}《上安州裴长史书》：“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之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1]1243} 此处叙及与西凉王室关系，但并未着意强调。天宝后，唐玄宗扩容宗正属籍政策的影响日渐放大，不仅让李曷孙辈四房归入宗正属籍，而且还同意李彦允隶入宗正属籍的申请，又提升凉武昭王李曷为兴圣皇帝，这一系列举措，对李白也会有影响。这可由二事见出：

首先，关于同姓的称谓有所变化，天宝前，称同姓者或直言“兄”“弟”，或言“从兄”“从弟”。如：开元十八年所作《幽歌行上新平长史兄粲》；开元二十二年（734）之《赠从兄襄阳少府皓》《夏日诸从弟登汝州龙兴阁序》；开元二十四年（736）作《冬日于龙门送从弟京兆参军令问之淮南觐省序》；开元二十五

年(737),《答从弟幼成过西园见赠》《春夜宴从弟桃花序》;开元二十七年(739),《送侄良携二妓赴会稽戏有此赠》;开元二十九年(741),《赠从弟冽》《秋日炼药院镊白发赠元六兄林宗》等。天宝后,称同姓者多言“族兄”“族弟”,如李白诗:天宝二年(743)所作《送族弟绾从军安西》《同族弟金城尉叔卿叔照山水壁画歌》;天宝三载(744)所作《同王昌龄送族弟襄归桂阳二首》《对雪奉饯任城六父秩满归京》;天宝四载(745)所作《陪从祖济南太守泛鹊山湖三首》《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送族弟凝至晏堧单父三十里》;天宝五载(746)所作《送族弟单父主簿于郭南月桥却回栖霞山留饮赠之》等(少数例外,如天宝五载之《鲁中送二从弟赴举之西京》《对雪献从兄虞城宰》);天宝六载(747)作《题瓜洲新河饯族叔舍人贲》《登梅岗望金陵赠族侄高座寺僧中孚》《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同族侄评事黯游昌禅师山池二首》;天宝九载(750)所作《登黄山凌歊台送族弟溧阳尉济充泛舟赴华阴》《寻阳送弟昌龄鄱阳司马作》等。这一情况至天宝十载(751)后才结束。除了少数几首,基本上又恢复到开元年间的状态,直称“兄”“弟”,或从“兄”“弟”;如天宝十一载(752)李白所作《赠清漳明府侄聿》《赠临名县皓弟》《寄从弟宣州长史昭》《赠从弟宣州长兄昭》《宣州长兄昭赠余琴溪中双舞鹤诗以见志》诸诗;天宝十二载(753)所作《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秋于敬亭送从侄端游庐山序》;天宝十四载(755)作《泾川送族弟綰》《陪族叔当涂宰游化城寺升公清风亭》;至德元年(756)作《感时留别从兄徐王延年从弟延陵》;乾元元年(758)所作《流夜郎至江夏陪长史叔及薛明府宴兴德寺南阁》;乾元二年(759)作《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游衡岳过汉阳双松亭留别族弟浮屠谈皓》《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上元元年(760)作《江夏使君叔席上赠史郎中》;宝应元年(762)作《醉后赠从甥高镇》《赠别从甥高五》《献从叔当涂宰阳冰》等。

凡加“族”者,多出现于天宝二年到天宝九载这段时间,也就是在玄宗对宗正寺属籍扩容之时,他变换同族称谓,应是对这一政策的响应。在这一时期,他作为凉武昭王后人的属籍意识上升,需要向人表明与皇室同宗同源的身份,希望以此拉近与皇家距离。天宝九载后,追求属籍的努力失败,又回到之前称谓,不再着意强调“族”字。虽然,他所说的同族概念比较随意,并无严格清晰的房系依据,如他称李阳冰为族叔,而李阳冰是赵郡李氏,并不属陇西李氏。

其次,李白离京后就去找从祖李彦允,应与唐玄宗批准李彦允属籍宗正寺申请有关。李隆基于天宝元年七月批准,李白天宝三载春离京去找他,二者当有关系。只是李阳冰所言“从祖陈留采访大使彦允”,非李彦允当时之职,其事也不是发生在陈留。具体考辨如下:

一是由李彦允仕宦历程看:天宝元年,唐玄宗准许李彦允入宗正籍诏书中称其职位是殿中侍御史(从七品上),采访使作为使职本身并无官品,但对于充任者有一定的品级要求。京、都两畿采访使以御史中丞充任,为正五品上。诸道则以府尹、大府长史、中府都督、上州刺史充任,为正、从三品,一般任期是三年。从从七品上到从三品下,相隔十五级,正常需用十年以上才能走完,依此推断,天宝三载李白所见之李彦允不可能是河南采访使。

二是从天宝年间河南采访使任职时间排序看,李彦允为此职当在天宝末。郁贤皓师《唐刺史考全编》所列较全,稍作调整(补入张倚改陆景融秩序),可列表如下:

表2 天宝年间陈留太守河南采访使人名排序表

序	时间	人名	文献依据
1	开元二十七年至天宝元年(739—742)	齐澣	《旧唐书·玄宗纪下》:开元二十七年九月,“汴州刺史齐澣请开汴河下流。”《资治通鉴·天宝元年》:四月壬寅,“又以汴州刺史河南采访使齐澣为少詹事。”
2	天宝元年(四至十月)	裴宽	《旧唐书》本传:“天宝初,除陈留太守兼采访使。寻而范阳节度李适之入为御史大夫,(十月)除宽范阳节度兼河北采访使替之。”
3	天宝元年—二年(742—743)	裴敦复	《太平广记》卷一四七引《定命录》:“陈留太守裴敦复闻而召问……改后韦恒为太守,未到而卒。”

续表2

序	时间	人名	文献依据
4	天 宝 二 年—三 载 (743—744)	张利贞	《太平广记》卷一四七引《定命录》:“陈留太守裴敦复闻而召问……改后韦恒为太守,未到而卒……寻又张利贞主郡,卒于城中。”
5	天宝元年—二年	严挺之	《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五载:“(天宝元年)夏四月壬寅,以(严挺之)为詹事,又以汴州刺史河南采访使齐澣为少詹事。” ^[13] 卷二一五,6854
6	天宝三载(744)	李彦允	李阳冰《草堂集序》:“遂就从祖陈留采访大使彦允。”独孤及《唐故给事中赠吏部侍郎萧公(直)墓志铭》:“大历三年授给事中……前后居官二十……所从之主……汴州刺史李彦允。”
7	天宝四载(745)	徐恽	《金石录》卷七:“《唐陈留郡太守徐恽碑》,天宝五载八月。”《宝刻丛编》卷二十作“天宝六载二月。”
8	天宝五载(746)	韦陟	《旧唐书》本传:“李林甫忌之,出为襄阳太守兼本道采访使,又改陈留采访使。”
9	天宝五载(746)	张倚	《唐会要》卷四十一:天宝五载七月二十三,河南道采访使张倚奏:“诸州府应缘春秋二时私社,望请不得宰杀,如犯者请科违勅罪。”从之。 ^[6] 卷四十一,857
10	天宝六载(747)	陆景融	《旧唐书·陈象先传》:(弟)景融,历大理正、荜阳郡太守,河南尹、兵吏侍郎、左右丞、工部尚书、东都留守、襄阳太守,陈留郡太守,并兼采访使 《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云:“(天宝六载)十二月丙辰,工部尚书陆景融卒。”
11	天宝七、八载 (748—749)	薛江童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三)下》:(薛)江童,字灵运,陈留太守,河南采访使
12	天宝九载—十二载 (750—753)	元彦冲	《全唐文》卷三五七高适《陈留郡上源新驿记》:“伊陈留雄称山东,声英海内……壬辰岁,太守元公连率河南之三载也。”又卷三七三陈兼《陈留郡文宣王庙堂碑并序》:唐天宝十有一载,岁次寿星,陈留改文宣王宫,郡守河南道采访处置使元公彦冲所以崇德树风,敬教劝学也 《册府元龟》卷六六四:“元彦冲,玄宗时为陈留郡太守……天宝十二载坐失移官。”
13	天宝十二载(753)	王浚	《唐会要》卷七八:天宝十二载八月,“灌南道采访处置使陈留郡太守王浚等奏。”《全唐诗》卷二五五苏源明《小洞庭洄源亭宴四郡太守诗序》:“天宝十二载七月辛丑……陈留太守王公命属官湖城主簿王子说会五太守于东平议。”
14	天宝十三、四载 (754—755)	李某	《全唐文》卷三二三萧颖士《蓬池楔饮序》:“天宝乙未暮春三月,河南连帅领陈留李公以政成务简……率府郡佐吏二三宾客饮于蓬池。”又《陪李采访泛舟蓬池宴李文部序》:“今兹春岁聿早,俾巨鹿守李公往焉……已而襄国士女结去思之怨,大君愍然,又命公族之良文部侍郎东阳继焉……登朝而备履清贯,出守而再践名邦……秋七月,巨鹿舟與次于是都,明使君客焉……温温二公,善可知焉。” 又卷三二二萧颖士《莲蕊赋并序》:“己(乙)未岁夏六月,旅寄韦城,忧伤感疾,肿生于左胁之下……友生于逖、张南容在大梁闻之,以言于方牧李公。公,予之旧知也,俯垂惊嗟,远致是散。”
15	天宝十四载(755)	郭纳	《新唐书·玄宗纪》:天宝十四载十二月“辛卯,(安禄山)陷陈留郡,执太守郭纳。”
16	天宝十四载(755)	张介然	《旧唐书·玄宗纪》: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以卫尉卿张介然为陈留太守、河南节度采访使。”

其中的第6号与第14号应为同一人,既然李彦允不可能在天宝三载为此职,天宝十四载“李某”当是他。

三是新出墓志给出了直接证据:据刘复(署河阳主簿)撰《唐故太子赞善大夫赐绯鱼袋琅邪王公(仙)墓志铭并序》云:“(王仙)天宝初,进士登科,署宋州襄邑县尉,天朝以此官为士之初秩。采访使李公彦允,奏充支使,以优选授左领军卫胄曹参军,后使郭纳表请如前职,其奉事以广平称。”^{[14]904}王仙天宝初进士及第,其为宋州襄邑县尉,或在其后若干年,一任之后,河南采访使李彦允奏报他为支使,后任郭纳续报。此处明确指出郭纳是李彦允河南采访使之后任。其前任李彦允的任期只能是天宝十二载到十四载。这与以上推论也是相符的。不过,在李白天宝十二载后所作诗中,似乎找不到他与李彦允交往相关的踪迹。天宝十载秋冬,李白北上幽州,十一载全年在河北活动,十二载春夏他由幽州南归宣州,其《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一诗道其北归之事,全诗未言陈留停留。天宝十三载,李白在宣城是确凿的,明汤宾尹辑《宣城右集》所录崔成甫《文殊普贤二菩萨功德记》言:“翰林学士李白哀而铭之曰:‘金瓯才辩,玉秀不实。惟佛之佛,乃能知之尔。’大唐天宝十三载龙集甲午十一月五日建,崔成甫书”,提供了重要佐证。显然,李白不太可能在这一时期到陈留与之交往。

四是据李彦允仕宦经历推断,萧颖士称其为旧友,可能是在开元二十三年赴举相交,李彦允约于此出仕。由《唐御史台精舍碑题名》知其开元末为监察御史(正八品),天宝元年为殿中侍御史(从七品),天宝二年为正八品侍御史(见劳格、赵钺著《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嘉庆刊本)卷一“姓氏目”第十页“碑左侧题名”,第十三页“侍御史兼殿中”。又见岑仲勉《金石论丛》中《〈元和姓纂〉所见唐左司郎官及三院御史》)。《唐郎官石柱题名》记其天宝十载前为六品金部郎中(见《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十五“金部郎中”)。上引“王仙墓志”表明王仙为宋州襄邑县尉,李彦允为其长官,即为宋州刺史,调任汴州刺史河南采访使后提拔他为支使,约在天宝十一载。

又,独孤及《唐故给事中赠吏部侍郎萧公墓志铭》:“(萧直)十岁能属文工书,十三游上庠,十七举明经上第,名冠太学,二十馀以书记参朔方军事。中丞府君之遇谗谪居也,公亦播迁汉东,移尉谷熟。至德二年,乃由廷尉评授监察御史,历河南府户曹、京兆府司录参军……所从之主,则朔方元帅张怀钦、汴州刺史李彦允、扬州刺史李成式、户部尚书李公峘、故相国今户部侍郎第五公琦、今相国黄门侍郎王公缙、中书侍郎元公载其人也。”^{[15]卷十一,9}墓主所从长官中有汴州刺史李彦允,与之对应职位应是谷熟县尉。谷熟县即虞城县,唐时属河南道宋州。文中所称人物官职都是最高职位,不是墓主与之交往时的职位,依此看来,李彦允赏识墓主时可能是宋州刺史。墓主二十四岁左右入幕为书记,再播迁汉东,再尉谷熟,可能需要十多年,其为谷熟尉应在天宝五载后,李彦允任宋州刺史也在此时。

又,李白《陪从祖济南太守泛鹄山湖三首》:

初谓鹄山近,宁知湖水遥?此行殊访戴,自可缓归桡。(其一)

湖阔数千里,湖光摇碧山。湖西正有月,独送李膺还。(其二)

水入北湖去,舟从南浦回。遥看鹄山转,却似送人来。(其三)^{[1]卷二十,937}

关于这位“从祖济南太守”,自来注家颇有争议,由上看来,极有可能就是李彦允(李清渊《李白与李彦允交游探微》已提出类似看点,文载《祁连学刊》1993年第2期)。齐州属上州,刺史为从三品(京外职,相当于朝中五品),宋州属望州,刺史品级高于齐州,李彦允任齐州刺史应在任宋州刺史之前,故其为齐州刺史可能是在天宝四载前,其为陈留太守河南采访使应在其为宋州刺史之后。综合以上信息,李彦允从天宝元年至天宝十三载的仕宦经历如下: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侍御史—金部郎中—济南太守—宋州太守—陈留太守河南采访使。天宝三载秋或四载秋李彦允正为济南太守,李阳冰序文中对李彦允的称谓,可能取其最高职位以示敬,属追忆性文字,不是他当时职位。

据上可断,李白在长安时可能与李彦允有过交往,李彦允到济南任太守,他就追随之来。其具体原因有三:一是李彦允刚刚成功申请进入宗正寺属籍,他与李彦允有从祖关系,有借机入宗正寺属籍的可

能;二是紫极宫济南郡官寺,李白希望借助李彦允的推荐,得到正式的宫观之职,如他的好友元丹丘一样。在上引诗中,他表示拜访李彦允不是像南朝名士王之猷访戴逵那样兴尽而归,而是像汉时李膺与郭泰那样精神契合。这种精神契合当指彼此的道教信仰。天宝初,李白同学玉真公主在王屋山云台宫主持大型的道教典仪,其好友元丹丘正在其身边担任职务。李白最初也是由道教修养而出名,唐玄宗初见李白时言:“汝为布衣,名为朕知,若非素积道业,何能如此。”可见,玉真公主向玄宗举荐也是充分肯定李白道教功底。由道入仕,本是李白设计的出仕道路。李阳冰序称:“遂就从祖陈留采访大使彦允,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箓于齐州紫极宫,将东归蓬莱,仍羽人驾丹邱耳。”末句用《楚辞·远游》“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意,有成仙长生之意,这是入道者的精神理想。关于这一次求道箓,李白有三诗记其事:《访道安陵遇盖寰为余造真箓,临别留赠》《奉饯高尊师如贵道士传道箓毕归北海》《草创大还赠柳官迪》,他先到济南北面平原郡安陵县请小道士盖寰制箓,盖寰是十多岁的小道士,诗言“能令二千石,抚背惊神聪”,表明盖寰是太守李彦允门下的常客;再让道士高如贵传授道箓,紫极宫在济南,授箓法师却要从北海郡请来;最后,由柳官迪验收其“大还”之业。三诗表明他是非常认真地也非常正式地完成了求箓、受箓、草创等入道程序。后一诗言:“姪女乘河车,黄金充辕轳。”在这一活动中,他可能花去玄宗赐金放还之金。又言:“捣冶入赤色,十二周律历。赫然称大还,与道本无隔。”“十二周律历”是指经过了一年十二月,李白天宝三载秋时到济南求箓,至次年秋结束。李白如此煞费苦心,就是要借助李彦允的举荐与见证,完成正式官寺道士身份的认定,又与他借宗正寺扩容之机完成宗正属籍认定的愿望相关。第三,他的这一系列的举动与当时道士与宗正寺关系相关。长期以来,道士是由宗正寺管理的,其名籍隶入宗正寺。《唐六典》卷十六“宗正卿·崇玄署”条载:“至开元二十五年,教以为道本,玄元皇帝之教,不宜属鸿胪。自今以后道士、女冠并属宗正,以光我本根,故署亦随而隶焉。”^{[7]卷十六,467}《唐会要》卷四十九《僧尼所隶》条载:“开元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中书门下奏巨等商量,缘至老子至流沙,化胡成佛法,本西方兴教,使同客礼,割隶鸿胪。自尔已久,因循积久。圣心以玄元本系,移就宗正,诚如天旨,非愚虑所及。伏望过元日后,承春令便宜。其道、僧等既缘改革,亦望此时同处分。从之。”^{[6]1006}“开元二十五年二月二日宗正卿鲁王道坚奏:‘今年正月七日勅,道士、女冠并隶宗正寺,其崇玄署,今既鸿胪不管,其署请属宗正寺。’勅旨依奏。”^{[6]卷六五,1348}玄宗于宗正寺内置崇玄署,让掌“天子族亲属籍”宗正寺专职掌管道教事务,强调本家在道教中的地位,认定道士为宗亲。能为官寺道士者就是入籍宗正寺,或取得与有宗正属籍者一样的身份。朝廷对度人入道的规定却非常严格,不仅有名额的限制,而且要求甚严。如,玄宗开元二十六年下令“其天下观寺,大小各度十七人。简择灼然有经业戒行,为乡间所推,仍先取年高者”。“为乡间所推”是一项重要条件,李白求李彦允即想借助族亲关系,得到道士身份,并凭此获得宗正寺属籍的资格。

开元末,崇道风盛,玄宗不断提升道士官方化地位,道士的选拔也趋于考试化,《唐会要》卷六十四载:

(天宝)二年正月十五日,改崇玄学为崇玄馆,博士为学士,助教为直学士,置大学士二员。

天下诸郡崇玄学改为通道学,博士为学士。二月四日,以门下侍郎陈希烈兼崇玄馆学士。其年二月十二日,勅两京玄元宫及道院等,并委崇玄馆学士都检校。^{[6]1325}

天宝二年玄宗又将道士改由吏部司封郎中管理,《唐会要》卷四十九《僧尼所隶》云:“至天宝二载三月十三日制僧尼隶祠部、道士宜令司封检校。”^{[6]1006}《通典》卷二三《职官五》记:“(尚书吏部司封)掌封爵、皇之族及诸亲,内外命妇告身及道士、女冠等。”^{[16]卷二三,634}这次变更,把官寺道士纳入朝廷正式官员的管理秩列,原来道士与宗正属籍只是概念化的等同关系,现在,以制度化形式确定道士、女冠与宗亲属籍一样,都归吏部司封郎中掌管。《唐会要》卷五十“尊崇道教”条载:“两京玄元宫及道院等,宜委崇玄馆大学士都检校,务在精修,勿令喧杂,仍不更隶宗正。其道士等名籍任依例程。”^{[6]卷五十,1015}道士也进入到正式官员选拔程序,不仅有专员兼任,而且要求要有“精修”之德,“勿令喧杂”。李白对自身道教修养本就自信,又得到从祖李彦允荐举,若能获得道士身份,就可以在道教系统里确认自己的宗室属籍。

因此,对于李白来说,获得道籍,是他得到宗正属籍的一个途径,也是他入仕的一种方式。其找李彦允,不仅是认亲归宗,而且是要入道求仕。

三、李白属籍追求失败的原因

李白的这一理想并没有实现,其《草创大还赠柳官迪》末言:“抑予是何者,身在方士格。才术信纵横,世途自轻掷。吾求仙弃俗,君晓损胜益。不向金阙游,思为玉皇客。鸾车速风电,龙骑无鞭策。一举上九天,相携同所适。”^{[1]633}此时他检讨自己“世途自掷”,表明求仕失败,求助李彦允获得宗室属籍身份,接受符箓,由道入仕,都未成功,只能以飞升仙道自足自慰。细析其事,其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漏于属籍,无征可信。由墓志看,申请属籍成功者,多是家世清楚,五世传承可信,上引李湛、李庭芝墓志,不仅能上溯远祖,而且能列五代世仕身份。而李白家世不明,既不能说出五代出身,也不能表明与凉武昭王的世系关系,即使是对他家世系最关心的李阳冰、范传正也是对此感伤不已。如李阳冰《唐李翰林草堂集序》言:

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圭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1]卷三十一,1443}

范传正《赠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言:

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成纪人。绝嗣之家,难求谱谍。公之孙女搜于箱篋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数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自国朝已来,漏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先夫人梦长庚而告祥,名之与字,咸所取象。^{[1]卷三十一,1461}

李、范所叙,一据李白口述,一是依李白儿子所记之事,既强调他是凉武昭王九代孙的身份,又具体说明他“漏于属籍”的原因。先辈流放至西域,已改换姓名,数代为贱,直至李白出生后,才指李树复为姓,这显然是沿续李家远祖的传说,强化自身的神奇性,但也拉大了他身世的不可信度。很难想象,宗正寺会接受他的解释。

其二,地位过低,无缘申请。向宗正寺申请属籍者,多是有一定身份与地位的人,或得到有力者的帮助,如《李庭芝墓志》云:“解褐补怀州参军事。再辟汾州司户参军,转荆府兵曹。本道使给事中韩朝宗,以清白荐用改少府监丞,加朝散大夫除栎阳县令,迁绛州司马加朝请大夫,换陈留郡长史、朝议大夫,移襄阳别驾,加中散大夫,进勋上柱国。凡八徙官而屡进阶,二京畿而六外郡。”^{[3]200}李庭芝就是得到了韩朝宗的举荐,由地方官升任京职,结束了十年低职磨勘。而李白也曾求助过韩朝宗,写下了“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恭维名句,也没效果,这应缘于他家族社会地位过低。又,唐太宗《谕李袭志书》言:

卿昔久在桂州,仍属隋室运终,四方圯绝,率众保境,未知所统。朕抚临天下,志在绥育,眷彼幽遐,思沾声教。况卿朕之宗姓,情异于常,一家弟侄,并立诚效。公又分遣首领,申谕诸州,情深奉国,甚副所望。卿之子弟,并据州县,俱展诚绩,每所嘉叹,不能已已。令并入属籍,著于宗正。^{[8]卷三,13}

李袭志是在隋末久处远地,太宗时,投诚唐朝。唐太宗因其保境有功,诏令并入属籍,显然,对于这些来历不明的同姓者,如李袭志、李彦允等需由皇帝亲自下诏,才可得名入宗正寺。天宝初李彦允仅为殿中侍御史,品阶虽不高,但也是一员正式朝官,则可以自报家门,申请入籍。李白称自家“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或许受到此事的启发,也想走这一条路。但因身份低微,无正式官员身份,就无法得到玄宗诏令入宗正属籍的待遇。

其三,未完成入道程序,未得官方道籍。李彦允确实也把他推荐给济南紫极宫中,只是天真的李白并没有耐性接受道家复杂的仪式与“还丹”程序,他自言“十二周律历”,整个过程以一年为周期,周而复始,反反复复。他约六月开始此事,到了次年七八月就返回兖州了,炼丹仅到“草创”阶段就结束了。因此,最终他也没有得到宫观之职。这事可由杜甫诗中见出。杜甫先在洛阳初识了刚离开京城的李白,写下《赠李白》:“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膾腥,蔬食常不饱。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17]卷一,15}估计受到李白道教狂热的感染,杜甫也诉说自己对道教的追求,再说到在求而未得之时,遇到了高贵而虔诚的李白,故视其为仙人。此处“金闺”之说,应是接受了李白“凉武昭王之后”的自述,“方期拾瑶草”一句表明李白向他讲出寻李彦允入道之事。后来杜甫又有《赠李白》言:“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17]卷一,15}本诗应是在李白由济南返回梁宋时写的。他们在前一年夏在洛阳分手,到了次年秋才在汴宋相见,虽然经历一年,李白得道家宫观之职的愿望仍然没有实现,故言其“尚飘蓬”,且直言其失败之因是“未就丹砂”,即没有完成道家修炼内丹的程序。李白是道教徒,对成仙飞升很迷狂,但他又是一个热爱世俗生活者,无法完全弃俗入教。

其四,所托非人,求援失败。李白为入籍之事求助李彦允,而李彦允自身是一个人品不可靠者,为人势利刻薄。如《南部新书》卷二云:“韦皋见辱于张延赏,崔圆受薄于李彦允,皆丈人子聿。后韦为张西川交代,崔杀李殊死。”^[18]《太平广记》卷一百四十八载:

崔相国圆,少贫贱落拓,家于江淮间,表丈人李彦允为刑部尚书,崔公自南方至京,候谒,将求小职。李公处于学院,与子弟肄业,然待之蔑如也。一夜,李公梦身被桎梏,其辈三二百人,为兵杖所拥,入大府署,至厅所,皆以姓名唱入,见一紫衣人据案,彦允视之,乃崔公也,遂于阶下哀叫请命。紫衣笑曰:“且收禁。”惊觉甚骇异,语于夫人。夫人曰:“宜厚待之,安知无应乎!”自此优礼日加,置于别院,会食中堂。数月,崔公请出,将求职于江南。李公及夫人因具盛饌,儿女悉坐。食罢,崔公拜谢曰:“恩慈如此,不如何以报效?某每度过分,未测其故。愿丈人示之。”李公笑而不为答。夫人曰:“亲表侄与子无异,但虑不足,亦何有恩慈之事。”李公起,夫人因谓曰:“贤丈人昨有异梦,郎君必贵。他日丈人遭难,事在郎君,能特达免之乎?”崔公曰:“安有是也?”李公至,复重言之。崔公踟躇而已,不复致词。李公云:“江淮路远,非求进之所。某素熟杨司空,以奉托。”时国忠以宰相领西川节度,崔既谒见,甚为杨所礼,乃奏崔公为节度巡官,知留后事。发日,李公厚以金帛赠送。至西川,未一岁,遇安禄山反乱。玄宗播迁,遂为节度使,旬日拜相。时京城初克复,协从伪官陈希烈等并为诛夷。彦允在数中,既议罪。崔公为中书令,详决之,果尽以兵仗围入,具姓名唱过,判云准法。至李公,乃呼曰:“相公记昔年之梦否?”崔公领之,遂判收禁。既罢,具表其事,因请以官赎彦允之罪。肃宗许之,特诏免死,流岭外。(出《逸史》)^{[19]卷一四八,1069}

据上述材料看,李彦允可能投降了安禄山,唐军收复东京后,被收治,又被其女婿崔圆救下。其时,河南府、洛阳长官多人受难,与张巡诸人比,李彦允人格显然有亏。乱前,看不起穷酸之表侄;乱时,贪生怕死,投靠叛军;乱后,又求其枉法救己。这样一个自私的人,自然不肯为无地位无实权的李白属籍之事去申请或担保。或许,在他看来,无职无位的李白竟想与他一样申请入籍宗正寺,几乎是对自己的讽刺。指望这样的人帮助自己,即使是尊对方为“祖”也是不会有结果的。

综上所述,天宝初,宗正寺虽有一场扩容活动,李白也曾为此兴奋过,也努力过,但最后仍陷入失望之中。热闹、光荣是人家的,与他无关。不清不白的身世,低贱的家庭成分,仍是他挥之不去的阴影。豪华高贵的血统,辉煌传奇的家族历史,只是他(或他父亲)编织出来的精神理想。即使他能一飞冲天,一鸣惊人,凭着自己才气一下走到玄宗的身边,也无法得到当权者的认可。据此,我们可对李白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有更深入的分析。

[参 考 文 献]

- [1] 李白. 李太白全集[M]. 王琦,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2] 郑樵. 通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3] 吴钢. 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G].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6.
- [4] 宋敏求. 唐大诏令集[G].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 [5] 刘昉.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6] 王溥. 唐会要[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 [7] 李林甫. 唐六典[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 [8] 董浩, 阮元, 等. 全唐文[G].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 1990.
- [9] 吴钢. 全唐文补遗: 第8辑[G].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5.
- [10] 吴钢. 全唐文补遗: 第4辑[G].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7.
- [11] 吴钢. 全唐文补遗: 第6辑[G].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9.
- [12] 吴钢. 全唐文补遗: 第9辑[G].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7.
- [13]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14] 赵文成. 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续编[G].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5.
- [15] 独孤及. 毘陵集(四部丛刊初编)[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6.
- [16] 王钦若. 册府元龟[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6.
- [17] 杨伦. 杜诗镜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2.
- [18] 钱易. 南部新书[M]. 黄寿成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 [19] 李昉, 徐铉, 等. 太平广记[G].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The Expansion of the Zongzheng Temple in the Early Tianbao Period and Li Bai's Innermost Feelings —The Ancestral Origin Records in Epitaph Literature and the Entire Story of Li Bai's Visit to Li Yanyun

Zha Pingqiu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Epitaph of Li Zhan* and other records indicate that during the late Kaiyuan and early Tianbao periods, Emperor Xuanzong of Tang expanded the membership of the imperial clan. This event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at the time, and many epitaphs listed it as the first sign of an elevated status. Li Bai was influenced by this event; his entry to the capital in the first year of Tianbao might be related to it. After leaving the capital in the third year of Tianbao, he directly sought out Li Yanyun, who was allowed to join the imperial clan due to the expansion policy. Before this, Li Bai only mentioned his ancestry as “the Li family of Longxi”, but later often referred to himself as a descendant of the King of Liang and Xiuwu. After the second year of Tianbao, the Taoist priests in the imperial observatories were transferred from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imperial clan to the Ministry of Personnel's Department of Ranks, entering the official selection system. Li Bai asked Li Yanyun, a high-ranking member of the imperial clan, to introduce him to receive the Taoist ordination and enter the Taoist register, also expressing his aspiration to obtain a position in the imperial observatories. Placing the relevant works in this context reveals not only the inequality and oppression Li Bai suffered under the system of noble status but also his spirit of continuous striving and perseverance.

Keywords: Zongzheng Temple; dilatation; epigraph; Li Bai; Li Yanyun

[责任编辑:陈忻]